

陶 庆 / 著

政治嵌入与政治安排

Political Embeddedness and Political Arrangement

政治学理论的发展需要与人类学知识结构的有机结合，是本书的重要
史实特征和显著特色。

运用政治人类学方法考察了古代政治文明演进的规律，揭示了古代政治
文明与西方古代政治文明，特别是“王权”、“贵族政治”和“法治”的
价值和意义。

从“王权”、“人民主权”和“国家主权”、“政治主权与土地主权”
等视角，揭示了社会王权政治文明的特征，揭示了从王权政治文明
与人民代表议会之间的内在本质关系和互动模式。

从国家、政治安排的内在本质关系和互动模式，揭示了国家、政治
安排的内在本质关系和互动模式，揭示了国家、政治安排的
内在本质关系和互动模式。

本书从政治人类学视角，揭示了国家、政治安排的内在本质关系和
互动模式，揭示了国家、政治安排的内在本质关系和互动模式，
揭示了国家、政治安排的内在本质关系和互动模式。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政治嵌入与政治安排

Political Embeddedness and Political Arrangement

陶 庆 /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政治嵌入与政治安排 / 陶庆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3

ISBN 978 - 7 - 5097 - 3134 - 5

I. ①政… II. ①陶… III. ①群众自治 - 群众组织 - 研究 - 中国
IV. ①D63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23225 号

政治嵌入与政治安排

著 者 / 陶 庆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皮书出版中心 (010) 59367127

责任编辑 / 桂 芳

电子信箱 / pishubu@ssap.cn

责任校对 / 刘伟雷

项目统筹 / 邓泳红

责任印制 / 岳 阳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季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889mm × 1194mm 1/32

印 张 / 16.25

版 次 /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字 数 / 375 千字

印 次 /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3134 - 5

定 价 / 5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研究得到以下项目资助

1. 2007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草根民间组织合法化治理”（结项号：20111402）结项成果；

2. 2010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政治体制创新中的‘党员主权’与‘政党主权’”（10YJA810023）阶段性成果；

3. 2011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政治人类学视野下的政治体制改革研究”（11JJD810018）阶段性成果；

4. 2011 年度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资助项目（NCET-11-0621）阶段性成果。

献给我的父亲：
一个社会底层的理想主义者

内容摘要

全书分设前言、六个章节、结语等三个部分，后附安徽省宣城市和深圳市福田区两个人类学田野研究中发放的四份调查问卷和八份调查表格。

安徽省宣城市的人类学田野经验研究表明，公民个人特别是私（民）营企业资本所有人与高级经理人员阶层的代表人物在国家“政治安排”下的政治参与模式，是 20 世纪 50 年代计划经济体制下解决社会主义“三大改造”遗留问题所采取变通政策的有益借鉴与有效延伸，主要表现为在代议制民主政治范式下，党和国家把这些典型的代表性人物有组织地“政治安排”为不同层级的“党代表大会代表”、“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治协商会议委员”，甚至一定行政级别的党内外领导等；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既有政治体制内吸纳新兴社会阶层中的积极力量、巩固和扩大执政基础、转变既有执政方式的突破性创新举措。

公民以个体身份在国家“政治安排”下的政治参与，其利益表达机制在现实政治生活中会发生嬗变，即公民个人一经享有国家“政治安排”下的政治待遇，他在既有政治体制内必须以政治化了的特殊身份，来表达“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以彰显执政党与国家的根本政治目标，而不便于直接表达与伸张自身所在特定社会阶层的特定权益。其结果是，该公民政治参与的最初动机与实际目的之间，必然会

出现相当大的偏差，即“政治安排”这一制度性安排，不足以充分实现公民预设的表达自身诉求等政治参与的直接目标，久而久之，这一框架下的政治参与动机发生转移，政治参与结果产生嬗变。

现实政治生活中，国家主导的政治体制内“政治安排”的政治参与模式，正向着公民个人从体制外以合群结社自治维权等形式“政治嵌入”地方政治生活中的新型模式过渡，并形成与国家“政治安排”传统政治参与模式共存并举、相辅相成的新局面。

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商业街私（民）营商人合群结社后草根民间自治组织合法化治理的人类学田野经验表明，国家主权政治权威在加强与创新社会管理过程中，能够与公民自由结社活动基于协商对话等“协商民主”范式，在程序正义、实体公正等法理基础上形成“正当妥协”的结构性良性互动关系，公民个人由此通过结社自治活动，从既有政治体制之外有效地参与到地方性政治活动中来；这样一种从体制外间接而主动地渗透到体制内的政治参与方式，具有经济社会学意义上的“嵌入”（embeddedness）内涵，即“政治嵌入”式的政治参与形态。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分层多元化、利益主体多样化，公民合群结社以“政治嵌入”方式主动地参与到地方政治活动中，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建构国家与社会之间结构性良性互动关系的重要形态。

国家“政治安排”——公民被动但直接参与政治，与公民合群结社——主动但间接“政治嵌入”政治活动中，这两种不同民主政治形态的政治参与方式，在本质上是人民主权与国家主权之间内在法理关系的外在表现形式。安徽省宣城市田野经验中所展现出来的国家主导“政治安排”的政治参

与形态，向着深圳市福田区商业街田野经验中展现出来的私（民）营商人合群结社“政治嵌入”的政治参与形态的不断演进与转型，试图揭示出主权在民的法理原则和人民主权决定国家主权的历史唯物主义价值观。

“人民”是近现代史以来，人类社会“神权”普降人间的物化形式，是一切政治统治合法性的唯一来源；但是，作为政治合法性的抽象物，“人民主权”的“人民”与“君权神授”中的“神权”一样，都无法在人类政治生活中找到具体的替身甚至是现实化身。近现代社会备受推崇的“人民主权”，因缺乏实践主体而易于沦为类似“神权”等的政治“神话”。“人民主权”的实现途径往往被视为人类社会普遍通行的代议制民主制度，但代议制民主只是人类社会民主政治的一种模式，而并不能完全等同于“人民主权”本身。

在法理层面，“人民”是“公民”基于社会认同的政治共同体；“人民主权”是公民自然法权基于政治认同的“集合”；保障公民自然法权，是保障人民主权、主权在民的题中应有之义。

公民自然法权衍生出人民主权，决定了公民个体与公民合群结社而形成社会自治组织等社会行动主体，在既有政治体制以外主动但间接地“政治嵌入”地方性政治活动，符合主权在民的程序正义与实体正当等法理精神。

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商业街的私（民）营商人合群结社，以草根民间结社形式，基于程序正义与实体正当，通过主动但间接的“政治嵌入”参与形态，与地方党委政府重构了结构性的良性互动关系，达成了国家与社会之间“正当妥协”的社会管理效果，这是建构和谐社会的重要现实途径。“政治嵌入”的民主政治资源，其前提是国家与社会双方能够基于

人民主权与国家主权之间的程序正义与实体正当等法理关系实现“正当妥协”。从民主范式来看，“正当妥协”属于区别于代议制民主范式的协商民主范式。国家与社会之间结构性良性互动的“正当妥协”民主范式，有利于克服代议制民主范式中的孔多塞悖论与阿罗投票悖论，有利于实现人民主权、主权在民的法理原则，有利于建构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前 言

安徽省宣城市私（民）营企业资本所有人与高级经理人员以国家“政治安排”（political arrangement）^①形态，直接

① 政治安排（political arrangement）的概念最早是由毛泽东提出来的，后经多次中共中央高层会议研讨而正式形成，是关于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区别对待工商业资本家的一种政治策略。

第一，毛泽东于1955年10月29日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首次提出，“我们现在采取的这个方法，是经过许多的过渡步骤，经过许多的宣传教育，并且对资本家进行安排，应当说，这样的办法比较好。对资本家的安排主要是两个，一个是工作岗位，一个是政治地位，要通统地安排好。”（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第349页）

第二，1955年11月16～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会议，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代表出席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提出，“为了进一步展开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必须在私营工商业者中间培养出一批核心分子。每个大城市应当有几百个这样的核心分子，每个中小城市也要有几十个或者几个这样的核心分子。这些核心分子由于接受党的教育，提高了他们的政治觉悟，逐步地解决了下决心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因此他们逐步地不怕共产了，能够团结在党的周围，向私营工商业者进行宣传和组织的工作。党委应当经过党委负责人、政府工作人员、统一战线部门的工作人员和经济机关的工作人员，经常教育这些核心分子，关心和指导他们的工作，切实解决他们的疑难问题和困难，经过他们去团结私营工商业者。”（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第466页）

第三，在这次会议上，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该决议草案指出：“我们对于（转下页注）

但被动地参与地方性政治活动的经验，与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商业街草根民间商会组织以“政治嵌入”（political embeddedness）^①形态，主动但间接地参与地方性政治活动的经验，

（接上页注①）资产阶级，第一是用赎买和国家资本主义的方法，有偿地而不是无偿地，逐步地而不是突然地改变资产阶级的所有制；第二是在改造他们的同时，给予他们以必要的工作安排；第三是不剥夺资产阶级的选举权，并且对于他们中间积极拥护社会主义改造而在这个改造事业中有所贡献的代表人物给以恰当的政治安排”。（参见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第154页）

- ① 参见以下资料：“政治嵌入”（political embeddedness）是指公民个人或者公民自治组织在社会活动中，自觉与不自觉地隐含着带有一定指向性的政治性利益的表达与诉求。“嵌入”源于美国经济人类学家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在他的名著《大转折：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的起源》（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Boston: Beacon Press by arrangement with Rinehart & Company, Inc., 1944.）中关于“embeddedness”（“嵌入”）的论述。在这里，“嵌入”是指，在前资本主义时代的人类社会中，由于生产力落后，人们的经济活动没有市场化，经济交往过程中渗透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但是，工业革命之后，由于社会分工特别是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经济交往过程中的社会关系逐步退化为以经济利益为核心内容的理性行动。但是，真正把“嵌入”观念演绎成为流行术语的是美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他于1985年在《美国社会学期刊》发表了题为“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嵌入的问题”的文章（“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1 (3): 481 - 510, November 1985）。在该文中，Mark Granovetter重新定义了“嵌入”的概念，即指出，在工业革命以后，人们的经济交换大多趋于市场经济中的理性交换，这种市场经济中的理性交换不仅嵌入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而且还广泛地嵌入了政治、文化与社会等诸多方面的关系。也就是说，随着现代文明的不断推进，人们经济交换中所包括的政治、文化与社会等其他范畴的因素，不仅不会消失，而且会以网络化、全球化等结构性特征更深入更广泛地存在。这一新观念的引入，标志着“新经济社会学”的诞生。同时，此后，“嵌入”一词被引用于其他社会科学领域，成为多学科共享的学术话语。本研究中的“政治嵌入”，即指（转下页注）

两者具有鲜明的可比性与互补性;^① 这不仅仅是两个个案的微

(接上页注①)公民与社会团体的非政治性活动中,蕴涵着政治参与的性质与特征。附有关资料如下:

Ethan Michelson, "Lawyers, Political Embeddedness, and Institutional Continuity in China's Transition from Socialism", *America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ume 113, Number 2 (September 2007), pp. 352 - 414.

Catherine Welch, Ian Wilkinson, "The political embeddedness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Networks",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Review*, Volume 21, Number 2, 2004, pp. 216 - 231 (16), Emerald Group Publishing Limited.

Chong Ju Choi, Raman Manoj, Olga Usoltseva, Soo Hee Lee, "Political Embeddedness in the New Triad: Implications for Emerging Economies",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Review*, July, 1999.

Anna Bengtson, Cecilia Pahlberg, "Political Embeddedness of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usiness Environment*, Vol. 2, 2009, No. 4, pp. 418 - 434.

Jane Hardy, Frank Currie, Zhen Ye, "Cultural and Political Embeddedness, Foreign Investment and Locality in Transforming Economies: The Case of ABB in Poland and China", *Competition and Change*, Vol. 9, 2005, No. 3, pp. 277 - 297.

Zheng Lu, "Political Embeddedness as a Double-edged Sword: Firms in China's Stock Market",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Annual Meeting, Sheraton Boston and the Boston Marriott Copley Place, Boston, MA, Jul 31, 2008.

陆益龙:《嵌人性政治与村落经济的变迁——安徽小岗村调查》,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 ① 参见以下资料:(1)关于公民个人特别是私营企业主在体制内被“政治安排”来参与皖南宣城市七县市区的地方性政治活动的人类学研究,系本人赴宣城市做田野调查期间(2002年元月至2003年元月),在市委、市人大、市政协等相关部门和七县区委(含市开发区工委)的大力支持下完成的。其间,在长达一年的时间内,以上单位协助笔者与100多位在不同类型、层次制度内政治参与的私营企业主进行过面对面的对话和沟通,组织了10多场相关人士参加的座谈会,有针对性地现场发放并回收了320份调查问卷,并提供了及时有效的相关文献资料,特别是提供了505名宣城市私(民)营企业主调查样本的有关文献资料。

(2)笔者于2004年9月至2005年底期间,长时段在深(转下页注)

观经验，而且在相当程度上构成了当下中国的社会事实。^① 国家政治权威在加强与创新社会管理过程中，能够与公民自由结社活动基于协商对话等“协商民主”范式，在程序正义、实体公正等法理基础上形成“正当妥协”的结构性良性互动关系，公民个人由此通过结社自治活动，从既有政治体制之外有效地参与到地方性政治活动中来；这样一种从体制外间接而主动地渗透到体制内的政治参与方式，具有经济社会学意义上的“嵌入”（embeddedness）内涵，即“政治嵌入”式的政治参与形态。当下中国的新兴社会阶层政治参与方式，已经由公民个体在国家主导下的“政治安排”形态，向着合群结社“政治嵌入”形态过渡与转型。

一 “政治安排”与“政治嵌入”的主权诠释

西方汉学者曾从中国华南地区的人类学经验研究中得出结论，认为 20 世纪中期以来，中国国家权威力量过于强大，逐步改变了过去国家权威只能向下延伸和渗透到县一级行政单位的历史传统；新中国成立后的国家权威，能够不断把权

（接上页注①）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商业街展开华强北商人自治组织政治参与的形式、内容与合法性等课题的人类学研究。在田野期间和其后写作期间，该项研究得到过以何国平先生为代表的福田区有关政府职能部门的大力支持，以及以黄建跃先生为代表的华强北商业街商人自治组织三届主要负责人和有关工作人员的鼎力相助。

① [法] E. 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准则》，狄玉明译，商务印书馆，1995，第 23～34 页。“社会事实”主要指“一切行为方式，不论它是固定的还是不固定的，凡是能从外部给予个人以约束的，或者换一句话说，普遍存在于该社会各处并具有其固有的存在的，不管其在个人身上的表现如何，都叫做社会事实”。

力触须有效向下延伸渗透，直接控制与操纵乡村、居委会和社区等县级以上行政单元；这种现象被描述为社会与个人在高度权威压制下的“细胞化”（cellularized）^①现象。社会“细胞化”理论与早期西方政治哲学领域中提出的社会“原子化”（atomization）^②概念有一定的相似性。所谓社会“细胞化”与“原子化”的核心观点，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均能找到思想“原型”。马克思在研究法国问题时撰写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他第一次提出了社会碎片化的“马铃薯”理论。^③在这里，马克思的“马铃薯”理论范畴，

① Helen Siu, *Agents and Victims in South China*, Yale: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萧凤霞（Helen Siu）在对我国珠江三角洲的一个乡村社区的人类学调查中，在乡村研究中引入了国家的角色，着力描述国家权威力量全面掌控乡村社会，并使之“行政化”的过程、原因与结果。她研究的乡村社会在80年的社会变迁中，经历了四个历史演变阶段。一是传统精英的自治时期，二是地方强人的垄断时期，三是乡村干部“精英化”时期，四是改革开放以后的社会复兴时期。萧凤霞对广东乡村社会的研究的鲜明特征是将国家权威纳入了乡村研究的范畴中，把国家权威与民间社会的互动关系置于社会变迁的主轴之上。

② 参见以下资料：William Kornhauser, *The Politics of Mass Society*, Free Press, Glencoe, Ill., p. 40.

Carl J Friedrich (ed.), *Totalitarianis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社会“原子化”的主要特征，是公民个人之间的社会性联系空前缺乏，或者如果存在一些个人间的社会联系，那么公民个人之间的主要联系载体必然是一个共同的国家权威或者政党权威。换言之，公民个人之间的社会联系不能通过自身认同的社会属性而直接发生。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677～678页。马克思文中论述，“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简单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数百万家庭的经济生活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就这一点而言，他们是一个阶级。而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地域的联系，（转下页）

针对的主要是以农民为主要人口，并实行经济上高度集中、政治上高度集权的没落法国王朝统治。马克思指出，正是因为公民个体的“马铃薯”化和公民权利的虚无化，才导致了法国 1848 年革命最终夭折。显然，这一论断的含义与社会“细胞化”甚至“原子化”范畴，在背景与用意上仍存有重大区别。

西方汉学家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中公民个体之间的社会关系，简单地描述成“细胞化”的学术观点，受到了新权威主义理论的尖锐批评；但是批判的“武器”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理论批评需要中国确凿的本土资料来实证支撑。社会“细胞化”的学术论断，始于西方汉学家对于中国基层社区的人类学研究结果；如果要从政治科学的学术层面给予回应，应当回归到中国本土的地方性知识^①来寻找论据，即以中国本土的地方性知识为依据，来建构中国学术的自我认同，探索中国转型期的“文化自觉”^②路径。

(接上页注③)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共同关系，形成全国性的联系，形成政治组织，就这一点而言，他们又不是一个阶级。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因此，“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

① [美] 克利福德·吉尔兹：《地方性知识：从比较的观点看事实和法律》，《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王海龙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第 242 页。

② 费孝通：《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 年第 3 期。同时参见陶庆《中国社会学的拓展与夯实》，《学术研究》2004 年第 11 期。在 2004 年于北京大学召开的全国首届博士后“中国社会运行与变迁”学术研讨会中，大会组委会主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刘世定教授，依据费孝通先生的“文化自觉”思想，强调提出了中国社会研究中的“学术自觉”的概念。他指出，（转下页注）

西方语境中的中国社会“细胞化”趋势，意味着国家政治权威刚性力量不断强化，并迫使过去“天高皇帝远”的边远社区，全面系统地沦为被控制状态中的“网络单元”；而传统社会中相对独立自主的最基层社区的“国家化”趋势逐步成为社会常态，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力量博弈失去平衡，呈现向国家权威“一边倒”的泛国家主义化的政治集权形态。

当下中国国家与社会之间结构性互动关系果真如此吗？两例政治人类学的经验研究或许能够提供解决这类问题的地方性知识。第一个人类学经验研究是指，跨世纪期间，安徽省宣城市部分私营企业主以个体公民形式被地方党政部门“政治安排”（political arrangement）为地方党代表大会代表（党代表，以下同）、地方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大代表，以下同）、地方政治协商会议委员（政协委员，以下同），甚至被安排担任地方党政部门一定级别的领导等等，这些“代表”、“委员”或者地方“领导”在现有政治体制内能够以特殊身份获得直接但被动地参与地方性政治活动的政治权益。第二个人类学经验研究是指，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商业街^①私营商人合群

（接上页注②）100多年来中国社会研究中的学术思想发展有三个发展阶段，这是学术自觉产生的历史渊源。一是中学西学之争，涉及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西方文化的早期碰撞和冲突，但没有涉及对中国社会的研究。二是社会实践和政治实践的自觉，即中国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开始了对中国社会的研究，具有强烈的应用、工具性色彩。三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开始了中国社会研究的学术自觉，即学术界在“话语”的变化中，越来越意识到与西方社会进行学术“对话”的重要性。

① 编号GF—547：参见华强北管委办于2001年8月份统计的“华强北商业街情况简介”的部分内容。据华强北商业街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提供的截至2001年的资料显示，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商业区的前身——（转下页）

结社，在既有政治体制以外，主动但间接地“嵌入”当地政治活动中，获得了与当地党委、政府协商对话的政治身份。这种以非代议制政治活动形式影响地方性政治活动的政治参与形态，是基于程序正义与实体正当的国家与社

(接上页注①) 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此地为原宝安县县城城郊的乡村；而 20 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期间，此地转型为以生产电子、通信、电器产品为主的工业区，拥有厂房 40 多栋。之后，由于经济发展，该地用工成本升高，导致工厂外迁，私（民）营商场入驻，这使华强北区域功能再次发生变化，深圳市与福田区政府把握住契机，1998 年开始对华强北商业街进行改造。共投资 4500 万元，首期 12 个改造项目于 1999 年 10 月全面竣工。（人行步道、跨街灯饰、电子显示屏、高低压电缆、休闲设施等）政府的投资带动了商家的积极性，各商家在整体改造方案基础上纷纷进行立面装修改造，投资总额 1.2 亿元。华强北商业街的形成是政府与商家共同努力促进的结果。华强北区域面积：华强北路南北 930 米，东西 1220 米，商业区总面积 1.13 平方公里左右；日平均客流量：30 万～50 万人次；华强北商业街规模及效益：商场总数 520 家，其中 9000 平方米以上的商场有 8 家；经营商户 9000 多户，大多为民营和个体工商户；纳税户 9000 多户；商业区年销售额 200 亿元；从业人员 10 多万人。华强北商业街作为全国首批“购物放心一条街”已获国家工商局授牌。华强北商业街的建成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华强北业态分布及特点为：汇集电子、电器、通信、钟表配套、服装、百货、金饰、银行证券、保险、房地产、酒楼宾馆等几十个行业，赛格、华强电子市场的电子配件产品远销东南亚。华强北商业街的特点为：综合功能齐全，是多功能、多业种、多业态的商业集合体，并能满足不同层次的消费者的购物需求。华强北商业街管理机构设置方面：华强北商业街的形成得到了市政府的确认，2000 年 5 月，市政府批准实施的《华强北商业街区管理暂行规定》是该商业街管理工作准则。2000 年 7 月成立华强北商业街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它于 2001 年 3 月正式开始运作，同时成立了华强北商业街党委，以加强对商业区流动党员的管理，该办公室直属区委区政府领导，是福田区政府在华强北商业街常设的派出机构。